

· 内部资料 ·  
· 注意保存 ·

# 成都供电发展简史

## (1905年—1981年)

四川省电力工业局成都供电局

一九八三年二月

# 成都供电发展简史

## 目 录

(1905年——1981年)

序 言	(1)
<b>第一章 解放前成都地区电业历史概况(1905年至1949年)</b>	(5)
第一节 成都地区电的“萌芽”及其发展	(5)
第二节 电荒和窃电	(8)
第三节 资本家的剥削，工人的苦难生活和斗争	(10)
<b>第二章 解放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(1950年至1952年)</b>	(13)
第一节 改组机构和调整人员	(13)
第二节 调解纠纷，抢修线路	(15)
第三节 分清敌我，解放生产力	(16)
第四节 整顿和加强用电管理	(17)
第五节 党、团，工会组织的建立	(18)
<b>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(1953年至1957年)</b>	(22)
第一节 配电网的升压改造和扩建	(22)

<b>第二节</b>	贯彻技术“法规”，加强技术管理	( 24 )
<b>第三节</b>	加强经营管理，降低供电成本	( 25 )
<b>第四节</b>	进行工资改革，增加职工收入	( 26 )
<b>第五节</b>	调整组织机构，加强领导力量	( 27 )
<b>第六节</b>	电网建设的主要成果	( 27 )
<b>第七节</b>	开展整风运动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	( 27 )

## **第四章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(1958年至1965年)** ( 29 )

### **(一)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(1958年至1962年9月)**

<b>第一节</b>	进行带电作业，减少停电损失	( 29 )
<b>第二节</b>	提高主变和输电输出力，挖掘设备潜力	( 30 )
<b>第三节</b>	推行“四合一”环形供电经验，提高安全供电的可靠性	( 30 )
<b>第四节</b>	加快建设成马线，为川西北新建工厂提供电力	( 31 )
<b>第五节</b>	组织群众护线，开展安全大检查	( 35 )
<b>第六节</b>	大搞“双革”促进电网发展	( 35 )
<b>第七节</b>	大抓生产自救，支援农业生产	( 36 )
<b>第八节</b>	“二五”时期组织机构变化概况	( 37 )

### **(二)三年调整时期(1962年10月至1965年底)** ( 38 )

<b>第一节</b>	历史背景及组织机构概况	( 33 )
<b>第二节</b>	电网发展概况	( 40 )
<b>第三节</b>	安全生产与职工培训	( 41 )
<b>第四节</b>	支援农业生产与基本建设	( 42 )

## 第五节 职工福利 (43)

## 第五章 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(1966年至1976年) (44)

- 第一节 组织机构及其领导成员的变化概况 (44)
- 第二节 电网发展概况 (46)
- 第三节 经济指标的完成与事故发生的情况 (48)
- 第四节 生产形势开始好转的两年 (49)
- 第五节 如何看待这十年的生产和工作 (50)

## 第六章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头三年(1976年10月至1978年) (52)

- 第一节 组织机构 (53)
- 第二节 设备及资产情况 (55)
- 第三节 各项生产任务的全面恢复和发展 (57)
- 第四节 前进中的科技工作和带电作业 (61)
- 第五节 建立规章制度，确保安全生产 (63)
- 第六节 政治工作 (66)
- 第七节 大力开展职工培训教育工作 (68)
- 第八节 职工生活福利的改善 (69)

## 第七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年(1979年至1981年) (72)

- 第一节 狠抓检修工作，不断提高安全运行水平 (72)
- 第二节 抓紧升压改造增容，解决电源和质量 (74)
- 第三节 加强企业管理努力增收节支 (76)
- 第四节 开展全员培训，提高职工技术业务文化水平 (77)

<b>第五节</b>	加强“三电”工作，满足农排和轻纺工业用电	(79)
<b>第六节</b>	发扬民主，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	(79)
<b>第七节</b>	积极改善职工生活福利，减少职工后顾之忧	(81)
<b>第八节</b>	局领导班子和职工的变动情况	(82)

**附：1949年至1981年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和图示以及体制机构变化情况说明 (83)**

<b>一、体制及机构变化情况说明</b>	(83)
<b>二、成都电网32年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</b>	
1, 1949年～1959年(见表一)	(84)
2, 1960年～1965年(见表二)	(85)
3, 1966年～1970年(见表三)	(86)
4, 1971年～1976年(见表四)	(87)
5, 1977年～1981～(见表五)	(88)
6, 1979～1981年(见表六)	(89)

**一、成都电网32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变化图**

(一) 供电职工人数增长图	(91)
(二) 发电装机容量增长图	(91)
(三) 输电线路长度增长图	(92)
(四) 输电线路条数增长图	(93)
(五) 变电站主变容量增长图	(93)
(六) 变电站建设座数增长图	(94)
(七) 线损率增减曲线图	(94)
(八) 最高负荷增长变化图	(95)

- (九) 负荷率变化图 (95)
- (十) 各类用电构成比重图 (96)
- (十一) 售电量增长图 (97)

# 成都供电发展简史

## 序 言

解放后的三十二年，成都地区广大职工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坚持“人民电业为人民”的宗旨，认真贯彻“安全，经济，多供，少损”的方针，围绕输、变、配和用电各个环节的不断加强与改善，供电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为全省电力工业和成都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早在1905年，成都就有了电，但解放前由于社会制度的关系，严重阻碍了电力工业的发展。直到1949年底，四十四年中成都地区供电范围，才仅有成都市区的部份主要街道和灌县城区得到照明供电，而工业用电微乎其微。当时所谓“电灯不明，马路不平，”尽人皆知。

可是在解放后的三十二年中，成都地区电力工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，迄今供电范围已扩大到十九个县市，供电面积为 $112 \times 122 = 13,644$ 平方公里，用电人口已达1000万人之多。现以1949年与1981年来一个对比：

从成都电网的发展来看：输电线路(35~220千伏)由57公里，增至1344.3公里，增长23.58倍，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.02倍，等

4.47番；变电站容量(35~220千伏)由2500千伏安，增至1,118,000千伏安，增长447.20倍，平均年增长率为19.44倍，等于翻8.75番；供电最大负荷由6070千瓦，增至398,000千瓦，增长65.57倍，平均年增长率为2.85倍，等于翻5.05番；线损率由38.4%，降至4.49%，减下33.91倍，平均年降低率1.06倍；售电量由1019万度，增至233,480万度，增长229.13倍，平均年增长率为9.96倍，等于翻7.43番；售热量由59年41,766百万大卡增至844,323百万大卡，增长20.22倍，平均年增长率为0.92倍，等于翻4.26番；公用配电变压器由10台增至272台，增长27.2倍，每平均增长率为1.01倍，等于翻4.85番；职工人数由100人，增至2476人，增长4.76倍，平均年增长率为1.08倍，等于翻了4.77番；电力用电占总用电量比例，由33.28%，增至91.05%，即由原来消费城市，彻底改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大城市了。

另外，从支援农业发展来看：至今已建成10千伏线路2700公里，配变3060台容量为258,096千伏安。而电力提灌站就建有53个，装机1623台，容量为502,368千瓦，电灌面积已达66,035亩之多。近几年来地方新建中小型水电站有255台机组，容量为60,615千瓦，从34个集中点并入成都大电网中，发展是很快的。

从以上三十二年来主要经济指标对比来看，成都地区供电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，同时供电质量和可靠性也有显著的改善和提高。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生活和工农业发展的需要。要不是“左”的错误干扰，发展速度和电网规模将会达到更快、更高的水平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指引，特别是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，展望未来，前景十分壮观，国民经济总产值要在本世纪末翻两番，这意味着增加4倍，成都地

区供电最高负荷预测将达到102万千瓦，售电量可达56亿度之多。各类设备和经济指标将成倍增长，企业技术、经营管理水平也会大大提高，加快发展的步伐。

为了使广大电力职工对成都电网的发展历史，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概况和主要经验教训，有个轮廓的了解，并从中吸取教益，发扬成绩，克服薄弱环节，为更快、更好地适应发展电力生产，作出积极贡献。故根据四川省电力工业局党委的指示，编写了这本《成都供电年发展简史》。

整个编写工作，在中共成都供电局委员委的直接领导下，党委书记罗晶同志的经常过问和支持下，成立了编写小组具体承担收资、编写、审定等工作。编写小组由杨家骐副总工程师具体负责，由黄宇充、黄筱芳、姚政忠、曾庆彬等同志分工拟稿，按撰写历史的编排、要求和写法、把解放前后、主要是解放后的几十年划分成七个时期来分工编写的（共计约五万余字），并由曾慧同志根据现有统计资料绘制图表，最后由白仲泉同志进行修改，杨家骐同志又作了全面编排、修改和复审，于1981年9~12月编出第一稿交党委后，又于1982年7~10月初正式提出第二次初稿，经局党委讨论同意定稿。在11月底经省电力局四川省电业发展史编辑组审核，并提出部份修改意见，于1983年2月底全面修改审定完毕，经党委决定同意铅印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为使所反映的资料，尽可能符合历史实际，先后到市档案馆、省电力局、市政府等单位收集资料和在本局领导、工程技术人员、经营管理人员、老工人和退休人员中举行了多次座谈会，进行讨论；并到家走访，回忆当时情况，搜集有关第一手资

料。虽经反复多次核对，尽管做了大量工作，但由于“文革”期间，不少历史宝贵资料、图表和照片原始记载均已散失不齐，有的资料失去了连续性，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，缺乏编写经验，对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编写等各方面，都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，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。

# 第一章 解放前（1905年至1949年）

## 第一节 成都地区电的萌芽及其发展

1905年（清光绪三十一年）四川总督锡良在省城银元局内安设发电机，供局内照明之用，此为成都地区“电”的萌芽。

1908年（清光绪三十四年）在猛追湾小水电厂和中新街小火电厂合并的基础上，在四川设劝业道，有人筹集白银二百两，试办小型火力发电厂，供商业场内照明用电。1909年（清宣统元年），商人陈养天见办电有利可图，邀约舒和轩、舒品轩、舒勤轩等16人，集资筹办“成都启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在中新街建厂，厂址在街对面，厂房门上书写“光明之源”四个大字，先后购西德25千瓦和70千瓦锅炉发电机组，安装发电。陈养天任经理，有职员8人。开初，装灯300盏，电压为直流110伏，仅供南新街、东大街一带用电，每晚供五至六小时。

1920年以后，随着椒子街发电厂的建立，最初是购英国的200千瓦锅炉发电机组。将中新街“光明之源”的发电机停下。以后将30千瓦瓦斯发电机组拆迁到彭县，成立彭县发电分厂。在1930年至1940年间又将70千瓦锅炉发电机组拆迁至彭县发电分厂，又将彭县发电分厂的30千瓦瓦斯发电机组拆迁至郫县，成立郫县发电分厂。

在1935年椒子街发电厂购进1000千瓦的西德的西门子发电机组，在1936年又购进2000千瓦西德的西门子发电机和英国的拨比克锅炉机组一套，将200千瓦机组卖出后，当时总装机容量为3000千瓦。

在原启明电气公司发电厂的机组容量逐年增加的情况下，供电时间和范围也不断地在扩大。包灯2927户，电力23户。总售电量285万度，其中工业用电占8%，照明用电占90%。

1939年，“启明”在麻柳湾设立分厂，为防日寇轰炸，由椒子街发电厂迁往一台1000瓩机组。1942年线路进一步扩展到市郊，外东牛市口至大观堰架线约7公里，兵工厂至麻柳湾分厂架线约4公里，外南延伸至双流簇桥架线7公里，外西光华村至黄田坝架线约4公里。1947年成都地区线路总长度达572·58公里，其中3·3千伏高压线路174·52公里，220伏低压线路398·06公里，配电变压器总容量5910千伏安，售电量9569千度。

1948年伪资源委员会为推销所属成燃煤矿（现都江煤矿）的煤炭，在灌县蒲阳村建都江发电厂，装机2000瓩，架设33千伏蒲蓉高压输电线路57公里。并在外南武侯祠侧兴建变电站一个，主变压容量 $3 \times 833$ 千伏安。此系成都地区最早的一个变电站，也是1955年以前唯一的变电站。都江电厂所发之电，经蒲蓉线输送至武侯祠变电站，降压后分两路供南门和西门一带。城内其余地区，由“启明”供电。起初，都江电厂派人驻成都抄表收费，后因“启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”经国民党政府批准确定成都地区为其营业区域，而都江电厂无权在此营业。通过协商，都厂只得将电趸售给“启明”，由“启明”每月按总抄电度向都江电厂付款。趸售电价，低于“启明”的电价。供电情况（见表1—1）

解放前夕，成都地区供用电情况（表1—1）

项 目		1948年	1949年	增减%
售电 量	合 计	用 户 数	12185	13777
		电 度(千度)	9037	10190
	其 中 工 业 用 电	户 数	248	224
		占总户数%	2·04	1·63
		电 度(千度)	3117	3391
		占总售电%	34·49	33·28
	其 中 照 明 用 电	户 数	11937	13553
		占总户数%	97·96	98·37
		电 度(千度)	5920	6799
		占总售电量%	65·51	66·72

迄至1949年，成都市工业用户数，仅占总用户数的1·63%，用电量仅占总用电量的33·28%。当时较大的工业用户只有裕华纱厂、申新纱厂、成都机械厂、建成面粉厂、兆丰面粉厂、建国纸厂等寥寥几家。耗电量最大的裕华、申新两纱厂，各装有320千伏安变压器一台，每月用电量亦不过10万度左右。照明用电的比例大大超过于工业用电。据1949年11月份“用电记录卡”的统计：商业用电占54%，市民用电占23%，伪军政机关用电占7%，路灯占6%，学校占5%。

1949年解放前夕，椒子街发电厂、麻柳湾分厂、都江电厂等设

备总容量计5500瓩。椒厂六路出线，麻厂两路出线。供电范围：东至黉门铺，南至三瓦窑申新纱厂，北至驷马桥，老西门至营门口，新西门至黄田坝机场。线路长度共计662·53公里，其中33千伏高压线路57公里，3·3千伏高压线路187·44公里；低压线路418·09公里，主变压器总容量2500千伏安；系统负荷率35·19%；电费回收率65%。

启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王彦立，副经理蔡家鲤，总工程师洪茂孚。公司本部设有营业科、电务科、会计科、总务科、用电监察处等五个部门。主管供用电生产业务的是营业科、电务科、用电监察处。

营业科105人，科长张秉兴，下设：(1)业务股，负责业务接洽事宜；(2)记录股，负责抄电表立卡片；(3)核算股，填写电费收据；(4)电费股，负责回收电费。

电务科90余人，科长余新正，下设：(1)配电股，负责外线及变压器安装；(2)接电股，负责接户线，电度表的安装、修校，装灯修灯；(3)修配股，修理变压器、电动机，查变压器负荷，拨变压器负荷等。

用电监察处10余人，负责解决用电及电费纠纷等事宜，主任为刘嘉兴。

## 第二节 电荒和窃电

国民党反动派对电业生产不仅不予扶持，反而横加摧残。在通货膨胀，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，伪经济部却规定电价为“部章统制”，不准随物价波动按比例调整，于是电价的调整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。下面是1937年至1948年米、煤和电价的上涨情况：(见

表1—2 )

1937年——1948年物价上涨比较表(表1—2)

	电价(每度)	米价(每斗)	煤价(每吨)
1937年	0·28元	1·2元	7元
1948年	20·8万元	180万元	1638万元
上涨倍数	90万倍	157万倍	240万倍

加之解放前夕，资本家热衷于投机倒把，无心经营企业，借口经济困难，暗中抽走资金，转做棉纱生意，对生产设备上的问题，能拖就拖，不坏不停，不停不修。致使线路、变压器分布混乱，木杆腐朽，横担东歪西倒，导线破损且不合规格。事故频繁，压负荷可随意拉开关，经常大片地区停电。电力供应不足，计划停电时间也越来越多。1948年5月开始实行分区六天停电一次，其后改为四天轮停一次，两天轮停一次，甚至一日数停，或连停数日。1949年一年中，停电多达485次。

如此严重“电荒”，苦煞了成都市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。据1949年2月16日《工商导报》报导：“受了停电影响，机械业光开支没有收入”，“停电使自来水断流，茶社叫苦”。同年，《新新闻》曾报导：“一青年患白喉求医，在医院动手术时遇停电毙命”。电的质量亦低劣，220伏的电压往往只100余伏，380伏的电压只200多伏。电灯呈红丝，马达开不转，人称“启明公司”为“岂明(?)电灯公司”“鸡鸣电灯公司”。

窃电现象普遍而严重。窃电方式甚多，有佔吃霸赊光用电不给钱者，有偷偷摸摸表外搭线者，有勾通公司人员内外配合窃电者。

当时有著名的“三大盗”“四小偷”。三大盗系指伪警备司令部、伪军校、伪航空委员会。四小偷指伪四川省政府、伪成都市政府、伪警察局、四川大学。据统计，窃电户1946年为986户，1949年增至1645户，相当于同年用户总数的14%。由于惊人的窃电外加线路年久失修，供用电管理不善等，1949年线损率竟高达38·4%。

此外，尚有一些长期拖欠电费的用户，如伪航空机械学校临近解放时，才将三辆破破烂烂的汽车（黑壳卧车一辆、中、小吉普车各一辆）抵押多年所欠电费。中吉普车解放后拨归线管所使用，此即成都地区供电部门最早的一辆汽车。

电荒和窃电加剧了启明公司的窘困，生产经营每况日下，常向银行贷款发工资。

### 第三节 资本家的剥削，工人的苦难生活和斗争

解放前，电业工人备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，凡进启明公司工作要找保人，立保证书。保人的条件是：(1)要以殷实商号（1000元银元以上的）为限；(2)要在保证书上盖用商号重要图章，不得盖用“闲章”；(3)保证商号如失其保证能力及信用时，要立即报告公司更换，并另具保证书；(4)保人退保要函知公司将所立保证书退还或更换后方可卸责；(5)保证书每年复查一次，各次复查，保证人均须加盖图章，以资证明；(6)被保人无论何事退职，须经公司审查6个月后，认为可免除责任时，始能退还保证书。

职工进公司后，必须履行下列规约：(1)遵守公司各种规章及当事人公布之各种文告；(2)工作时间不准外出；(3)全年事假不得超过一个星期，病假不得超过四个星期，逾者依旷工论，或扣薪或开

除；（4）住宿公司内，不能夜假外宿；（5）不能借用公司名义与别人担保及证明事项；（6）不能参加法令所禁之党社或团体；（7）对指派之任务及经手之事件须负完全责任，若有灾害、疾病意外不测等事，各听命运，决与公司无涉；（8）违犯公司规约，贻误事机，得由当事人予以撤职处分。除此，还在职工之间实行连环保，一人违规，株连一串。

生活上，工人与资本家贫富悬殊极大。从薪津看，经理薪津比工人薪津高27倍，总监工薪津比工人薪津高9至14倍，领工薪津比工人薪津高至4倍。公司没有家属宿舍，有家的职工只得从微薄的收入中，抽钱在外租一间半间房子住。而董事长陈国栋却用剥削来的钱修公馆三座，其中有名的陈家祠和老关庙公馆，谓之“冬天风吹不进，夏天蚊钻不入”，内有图书馆、阅览室、浴室、盆景室、古董房和大小客厅等六十余间，全家十口人（两儿、四女、大小老婆三个），而雇用的女仆、听差、厨工、开水工、司机等即有二十四人，请客吃一顿饭，花去的钱相当于十几个工人一月工资的总和。

为了缓和矛盾，年终，资本家也曾发给职工双薪或红息，但大都将其拨作股本。事隔几年，物价滚涨，股票形同废纸。

物价一日数涨，伪币急剧贬值，往往早上能买一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一升米，人心惶惶。职工每月领到薪津后，拔腿奔向“安乐寺”抢购银元或实物。否则，一个月的生活竟无保障。

职工的医药费全部自理，生病还得扣工资。杨钧同志患了一次霍乱，两年多始付清医药费。祝学良抄表跌伤了腿，自行借钱治疗。至于安全措施，劳动保护根本没有。内线外线工作均不停电，